

■ 新政治经济学译丛 ■

贫富与政治

[美] 戈登·图洛克 著

梁海音 范世涛等 译 / 马春文 校

**WEALTH, POVERTY
AND POLITICS**

GORDON TULLOCK

长 春 出 版 社

新政治经济学译丛

贫富与政治

[美] 戈登·图洛克 著
梁海音 范世涛等 译
马春文 校

长 春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贫富与政治/(美)图洛克著;梁海音 范世涛等译.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06.1

(新政治经济学译丛)

书名原文: Wealth, Poverty, and Politics

ISBN 7—80664—960—3

I. 贫... II. ①图... ②梁... ③范... III. 现代经济学
IV. F0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8182 号

责任编辑: 张耀民 封面设计: 郝 威

Copyright © Gordon Tullock 1988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邮编: 130061)

(网址: [Http: //www.cccbs.net](http://www.cccbs.net))

业务电话: 8563443 发行电话: 8561180

长春大图视听艺术传播公司设计制作

吉林省吉育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960 毫米 16 开本 12.25 印张 160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5.00 元

《新政治经济学译丛》

编委会

主编
编委

秦海	曾昭群			
马春文	冯军	吕传俊	余晖	张昕竹
张平	张晓晶	周汉华	唐寿宁	高世楫
路风	陶修明	王维德	刘杰	吕鹤
张宏俊	张颖新			

致中国读者

一直以来，经济学家对政治都非常感兴趣，毕竟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给政府的经济政策提供建议。然而，长期以来，政府的实际规划及其运行工作都是由政治学等其他领域的学者来研究的。这种情况大约在 1960 年发生了变化，从那时起，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发展起来了，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称自己为经济学家，但实际上却继续为政府运行工作而努力。考虑到这两个领域之间紧密的内部关系，这种现象是不足为奇的。

我们从早期开始，就已经在经济领域为政府政策提供好的建议。例如，亚当·斯密的关税讨论证明当时非常盛行的政府政策是不明智的。这一政策持续到今天也是不明智的，但是关税仍旧存在。对导致采用这种达不到预期生产目标的经济政策的政治结构进行考虑是非常重要的。

我有幸成为这一领域的先驱者之一。但是，直到现在，我的工作几乎还是全部沉浸在其他的领域中。许多年前我创办的杂志，是《公共选择》吗？是斯普林格出版的所有杂志中发行范围最广的。而且现在也有很多其他的这种类型的杂志和出现在经济文献中的公共选择的文章。

我非常高兴我的书译成中文。很久以前，我是国务院的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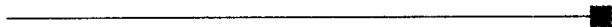


2 贫富与政治

中文官员。我的中文一直不是很好，但我对中国非常感兴趣，我希望中国会走向成功。我希望我这本书对中国走向成功能够有所帮助。

在此，我对出版社和译者的工作表示感谢，我希望能够看到中文译本，我衷心地祝愿中国的明天更辉煌。

戈登·图洛克



《新政治经济学译丛》总序

秦海

我始终坚信，在学术界发生的事情，对思想观念的发展和传播，以及最后对这些思想观念转变为现实，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詹姆斯·布坎南（1986）：《自由、市场与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

新政治经济学，在社会科学领域一直是被不同学者所使用、而不作出严格定义的一个术语，在不同学者的心目中似乎并没有达成一致性的认同^①。同时，新政治经济学也常常与政治经济学相混用。

政治经济学，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对于那些对个人的成长经历赋之于回忆或期望的人而言，在他们的成长的岁月中，所接受的政治经济学教育就是政治经济学，而且这是一门被称之为研究生产关系的学问。

按照经济思想史家的说法，政治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基石，或者被称之为是社会科学的皇后。据说，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产生于17世纪的法国，蒙特克雷蒂恩（Montchretien）在1615年最早使用了这一术语；在英语世界的文献中，詹姆斯·斯图亚特（John Stuart, 1761）是撰写《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第一位经济学家，并将政治经济学作为专著的书名。在西方世界的经济学思想传承中，存在着两种相互连接的思想来源：一是18世纪的亚当·斯密，另一种面孔是十九世纪的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它们所致力经济学一直被描述为政治经济的科学和经济治理的艺术。前者的目的是描述经济运行，后者的目的是识别治理经济的规律，并将之转化为经济政策（Mary S. Morgan, 2001）^②。根据英

①2005年1月8日下午两点，我在撰写这篇总序的时候，从google.com这一常用的搜索引擎上，键入new political economy，仅用了0.23秒就显现了1520万项与“new political economy”相关的条目；如果再键入“新政治经济学”汉文这一词条，搜索所有的中文网页，其相适配的网页也达到17万项。

2 《新政治经济学译丛》总序

国爱丁堡大学经济学系高级讲师斯图尔特·塞耶尔 (Stuart Sayer, 2000) 《新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一个总括》一文中的看法, 在 18 世纪到 19 世纪, 甚至到 20 世纪, 经济学经常被称之为“政治经济学”, “这一术语反映了当时的一种流行看法, 即经济学与政治学是紧密联系的, 政治因素在决定经济后果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①

“新”是相对于“旧”而言的, 作为丛书的编者所需要回答的问题, 新政治经济学“新”在何处? 按照塞耶尔的说法, 20 世纪 50~70 年代, 在新古典经济学所驱动的——至少在局部——为经济分析提供一个更加严肃的科学基础的过程中, 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效用和生产函数、市场互动的约束条件确实成为经济分析的重心, 但是, 在这一过程中, 政治约束确实也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 只不过经济学家的处理方式经常是松散的和不得要领的, 并且在某些文献中, 经常被称之为具有“右”派或“左”派的倾向, 直至肯尼思·阿罗 (Kenneth Arrow, 1963) 的《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邓肯·布莱克 (Duncan Black, 1958) 的《委员会和选举的理论》以及詹姆士·布坎南和戈登·图洛克 (James Buchanan and Gordon Tullock, 1962) 的《同意的计算: 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等经典著作出版之后, 政治经济学才有了“新”这一定语。

新政治经济学崛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和 80 年代早期。除了包括上述的人物之外, 按照塞耶尔 (Sayer, 2000) 的说法,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诺德豪斯 (Nordhaus, 1975) 和希布斯 (Hibbs, 1977) 关于机会主义和政党政治商业周期的理论、凯德兰得和普雷斯科特 (Kydland and Prescott, 1977) 以及巴罗和戈登 (Barro and Gordon, 1983) 关于时间不一致和名誉的理论, 以及滨田和幸 (Hamada, K, 1976) 关于货币政策的国际相互依赖性分析, 斯蒂格勒和波茨纳关于管制的分析以及克鲁格、巴格瓦提、斯尼瓦山、布坎南、托利森和图洛克等关于寻租社会的分析等^②。因此, 崛起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新政治经济学, 其“新”在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把政治过程纳入了分析对象, 而且直接与“弗吉尼亚

①Morgan, Mary S. (2001):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Economics: Engineering and Ideology, Working Paper No. 62/01, <http://www.lse.ac.uk/collections/EconomicHistory/pdf/wp6201.pdf>

②Stuart Sayer (2000): Issues in New Political Economy: An Overview,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 Vol. 14. No. 5, 2000.

学派”和“芝加哥学派”有关。

新政治经济学“新”的第二方面是，旨在打开经济政策形成的“黑箱”。在占据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政策的形成经常将经济政策决策看成是一个黑箱，在理性人或者是经济人行为的最优化中，政策工具和制度设计经常被自觉地作为外生变量来看待，或者是被排除在经济分析的范围之外。无论是规范分析，还是说明性的阐述，政策决策者经常被看成是一个乐善好施的社会计划者，他追求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大化。他会对资源配置的扭曲和无效率状态进行直接干预，在这样的分析中，这种干预可能导致的资源配置的再扭曲、棘轮效应等等都被舍弃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这种分析方法，自然有它的优点，起码从读者的立场看，不存在政治学的阴暗面，而且领会不到制度设计的细节和意识形态的包袱，有助于形成更加技术化的经济分析的风格和模式。实际上，在政策形成的过程中，无论制度背景如何，大量存在着“创租”和寻租的行为，一种政策的后果经常超出了决策者的意料之外。打开政策形成的“黑箱”不等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更可能是“叶公好龙”或者是政策形成过程本身所内植的“皮克马利翁”效应。

20世纪80年代是新政治经济学最为活跃的年代，根据旅美以色列经济学家艾伦·德拉正（Allen Drazen, 2000）的说法，“政治经济学是当今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不仅在宏观经济学上有所体现，而且在经济学的一般领域都是如此”。^①在这里，他实际上指的就是新政治经济学。在他看来，新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定义就是“政治学与经济学之间的互动研究”，尽管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含糊的定义，但是，它具有良好的“包容性”。因此，从德拉正的观点来看，新政治经济学不同于公共金融、公共经济学以及公共选择，因为它关注的经济决策的政治性质以及在一个社会中政治行为如何影响经济选择，而社会被定义为不仅包括特定主权的国家，而且包含了具有一定管辖权的组织，比如企业、社群或其他组织。从这一点上来看，新政治经济学“新”的第三个方面是，政治学和经济学所处理的研究对象都可以纳入到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来，而且可以对一些特殊的概念进行特殊的处理，比如“权力”、“权威”等

① Allan Drazen (2000): Political Economy in Macroeconom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 《新政治经济学译丛》总序

等。在新政治经济学看来,权力是一个人为了实现自己所追求的目标的能力;权威,也就成了一个人、几个人、或者更多的人明显地或者默认地认可某个人为他们在某些行动领域做出决策的状态。信息、知识、激励等理论这些在主流经济学发展中所获取的革命性发现也就被纳入了新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来源。20世纪80~90年代的新政治经济学也就顺理成章地包括了民主和政治权力的度量、新闻自由、人权、法院的独立性、产权保护、法律和司法制度的透明度、犯罪、腐败以及社会和政治暴力、政治不稳定等等方面的研究主题(Sayer, 2000)。^①

新政治经济学并不是为了复兴经济思想史中早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而是为了获得社会科学的突破。1996年,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创立了《新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New Political Economy)。其创刊词写道:“托克维尔曾经断言,新世界需要新科学。从现代的意义上看,新世界不仅表现为世界经济的新的发展,而且表现为一种全新的世界秩序,更重要的是,这些方面的发展和构成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接着这份创刊词继续写道,“理解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和世界经济发展的结构,需要一种全新的分析方法和理论,以便为清除智识上的障碍做好准备,并需要把不同的分析方法综合起来。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新政治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将19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广度和睿智与20世纪社会科学的分析性进展联系在一起”。绝大多数20世纪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是按照“两分法”展开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即国家与经济、经济行为者与经济结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等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从公共领域看,或者说在政治学领域,占据支配地位的制度就是国家;在私人领域,或者说在经济学领域,占支配地位的就是市场。新政治经济学把这些“分离”的两者融汇了起来。

新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新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之处,就是它与新制度经济学相互包容和互为促进。目前,在中国学术界,新制度经济学已经为大家所熟悉,提出这样的看法未必能够得到一致性的认同。约翰·道巴克和约翰·奈耶(John N. Drobak and John V. C. Nye, 1997)主编的《新制度经济学前沿》中的入选论文就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而且在前言中,他们也指出,交易成本与产权、政治经济学和公共选择、数量

^①Stuart Sayer (2000): Issues in New Political Economy: An Overview,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 Vol. 14. No. 5, 2000.

经济史(通常以制度和微观经济学作为理论背景)、认知、意识形态和路径依赖的作用等构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前沿性论题。当然,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也被有些学者称之为“实证的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说,是在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历史传承中所进行的理性决策研究(Jams E. Alt and Kenneth A. Shepsle, 1990),甚至干脆称之为“社会科学的基础科学”。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蒂莫西·拜斯莱(Timothy Besley)在2004年10月13日英国科学院的凯恩斯经济学讲座所作的《新政治经济学》一文中指出,“新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理解政策领域所产生的重要问题。虽然在一些场合经常存在着这样的暗示,但是,它并不是经济学家们为了向政治科学领域扩张而进行的一种努力。相反,它主要关注的是将经济学家们的能力扩展到需要某些工具才能进行经济和政治决策的问题上。”^①20世纪经济学范式的履新、分析工具的进展(博弈论、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等等),特别是“冷战”之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的边界已经大大地扩展了经济学家的职业能力,新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回应适逢其时,应运而生。就正如贝斯莱所言,“新政治经济学是关于扩展经济政策分析领域并因而强化它的相关性的学说”。就编辑这套丛书而言,我们的主张是,经济学家、公共政策决策者、学生以及对社会生活怀着强烈求真欲的人们,更需要理解政治行为、经济利益、社会矛盾、冲突和摩擦以及在各个层面所洋溢着的热情,这也是新政治经济学的使命所在。

2005年1月10日·北京

主要参考文献:

Alt, James A. and Kenneth A. Shepsle, 1990, edited: 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sley, Timothy(2004):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http://econ.lse.ac.uk/staff/tbesley/papers/keyneslecturetext.pdf/>

① Besley, Timothy (2004):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http://econ.lse.ac.uk/staff/tbesley/papers/keyneslecturetext.pdf/>

6 《新政治经济学译丛》总序

Blinder, Alan S. (1999): Economics Becomes A Science-or Does It?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April 23, 1999.

Drazen, Allen (2000): Political Economy in Macroeconom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robak, John N. and John V. C. Nye, 1997, edited: The Frontiers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cademic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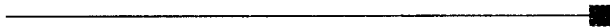
Morgan, Mary S. (2001):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Economics: Engineering and Ideology, Working Paper No. 62/01,

<http://www.lse.ac.uk/collections/EconomicHistory/pdf/wp6201.pdf/>

Sayer, Stuart (2000): Issues in New Political Economy: An Overview,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 Vol. 14. No. 5.

詹姆斯·M. 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平新乔、莫扶民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

詹姆斯·M. 布坎南、戈登·图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导 言

公共选择理论本质上是经济学家们对政治学的入侵。其多数先驱者都是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当然，威廉·赖克（William Riker）是一个显著的例外，他起先并不是一位经济学家。

我的基本训练都是法律方面的，在读法学院的时候我上过亨利·西蒙（Henry Simon）教授一学期经济学课程，但这对我一生影响巨大。尽管我的主要兴趣还集中在法学和政治学上，我开始整本整本地阅读经济学期刊（当时它们比现在好读些）。事实上，我后来进国务院（Department of State）当了名公务员，打算就此成就一番事业。凡我读到的关于政治学的内容都令人非常失望，这使我感到创造一种全新方法非常必要。奇怪的是，这个决定是在共产主义中国做出的。共产党控制中国后，由于国务院计划承认新中国政府，我和其余美国外交机构人员（American Diplomatic establishment）就被留在了中国。共产党切断了我们的通讯，但没有过分地干扰我们的日常生活。于是，我发现自己拥有大量闲暇时间和由美国新闻处（USIS）提供的相当数量的图书。我所阅读到的政治学文献令我确信，的确需要些更好的东西。

我从中国回来后，被派往耶鲁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学习中文和相关课程。一天，我在耶鲁生活合作社（Yale co-op）看到一大摞红皮书，书名是《人类行为：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作者是一个我从来没听说过的人——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我买了本来读。这是第一本我从头至尾读完的经济学著作，尽管

2 贫富与政治

那时，经济学已经基本上成为我的爱好了。

这部书对我影响很大。我当时并没有察觉到，它不仅为我提供了经济学的基础知识，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特别的视角（viewpoint）。读完一遍后，我又读了一遍。第二次读到关于方法论的导言时，我突然意识到我该如何建立一种关于官僚体制的理论，这种理论将适用于我在中国和国务院的经历。

由于当时正忙于学习中文，并先后被国务院派往香港、韩国，最后回到华盛顿，我把有关这个问题的严肃工作搁置了很多年。那段时间，我不断地在脑中咀嚼这个想法。当我和国务院终于分道扬镳时，我决定写一本关于官僚体制的书，然后在远东地区做些进出口生意。后来情况却并非如此。

我最终回归学术界，源于两种相互独立的影响。首先，我有一段时间待在纽黑文（New Haven），利用耶鲁的图书馆写一本书。在那儿，我遇到了理查德·沃克（Richard Walker），他邀请我到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的国际关系学系任职。

然而，另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发生了。为了散发给出版商，我将后来成为《官僚制政治》这本书的手稿印了约 20 册。我还把它们散发到了其他地方，其中我寄了本给在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辩论队认识的沃伦·纳特（Warren Nutter）。他转到了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随后在那里和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一起建立了托马斯·杰斐逊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哲学研究中心（Thomas Jefferson Center for Political Economy and Social Philosophy）。布坎南和利兰德·耶格尔（Leland Yeager）读了这本书。我估计沃伦没读，尽管我从不对此有十足把握。无论如何，他们三个向我提供了弗吉尼亚大学博士后研究经费。虽然我刚在南卡罗来纳大学待了一年，沃克还是大度地允许我接受这个机会。

在弗吉尼亚大学做博士后的第一年是深受启发的一年。我的经济学基础知识根基薄弱，而且我自己尤其不赞成福利经济学。布坎南让这两个方面都得到了转变。

我认为我对他和纳特的影响也同样巨大。他们沿着现存的政治经济学的思路，以一种十足谨慎的经济学方式思考。我几乎完全根植于政治学的截然不同的背景和兴趣刺激他们去采取一种更宽泛的视角，尤其是布坎南。无论如何，其结果对于建立我们现在称为公共选择的这个学科，当然意义重大。

那段时间，一部我实际上没有读过的书也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约翰·加尔布雷斯的《丰裕社会》。虽然我没读过这部书，但我确实读了许多评论并且感到相当恼怒。我决定写本书来证明，政府就像私营企业一样，会过度扩张，于是，《多数表决的问题》一文应运而生。这篇文章正是《同意的计算》的思想火种。

在等待《多数表决的问题》出版的同时，我写了另外两篇专论，但仅供当时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极少数人私下传阅，它们至今仍未正式出版。第一篇是《宪法理论初探》，这是迈向《同意的计算》的另一大步；另一篇，《企业家政治》，论证了隐蔽式互投赞成票(implicit logrolling)与公开式互投赞成票(explicit logrolling)带来的结果是几乎一样的。

然后，我回到南卡罗来纳大学任国际关系学助理教授。《同意的计算》是布坎南和我通过信函方式写成的，坦白讲，那之后的工作主要都是由他完成的。

当然，《多数表决的问题》以一种修订版本的形式在《同意的计算》中重现。这两个版本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然而，哪一个更好却不甚明确。本书收录的原始版本指出，以税收减免形式向少数人提供馈赠，可能以公共品供给的减少为代价。这一点在《同意的计算》中的版本里并没有出现，因为在写作那本书时，我们对于在累进税体系中，过度支出总是存在的可能性印象深刻。回顾从前，站在1988年的角度，而不是1962年的角度，我也不能完全肯定两个版本中的哪一个更接近现实。

在当时，这篇文章和这本书都被认为是相当具革命性的。很有意思的是，几乎是第一个在该领域写作了广泛流行的作品的人，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很不高兴。随之而来的就是他

4 贫富与政治

对《多数表决的问题》的批评和我的回复，两者在本书的版本中都收录了。我紧接着写的一篇文章《政治选择的经济分析》，其实是为南方经济学会年会（Southern Economic Association Meeting）准备的讲稿。安东尼·唐斯又一次成了评论人，而且强烈批判这篇论文。很遗憾，我没有留下他的评论和我的回答的底稿。

就我所知，在各地所有学术团体中，整个专题组专门讨论公共选择理论，这还是第一次。遗憾的是，除了专题组成员，我们仅有两位听众。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有所改进，事实上，一种传统已经建立起来了——在每次的南方年会上都设有公共选择理论的专题组。因此，在最初几年，公共选择理论在美国南方可能比在别的地方更为广为人知。

这一事件的另一个结果是，《同意的计算》和其中的论证方法似乎导致安东尼·唐斯放弃了公共选择理论。当然，还存在其他原因：他介入了他父亲的房地产研究公司（Real Estate Research Corporation），这占据了他大量的时间。不过，我的确认为托尼（安东尼的昵称——译者注）深切而热烈地迷恋简单多数表决这种决策方式，对怀疑这种决策方式感到痛苦，而这正是公共选择理论的特征之一。无论如何，自《同意的计算》出版到现在，他几乎再也没有在这一领域写作任何作品。最近，他正在写一本关于政治学的入门读物，有趣的是，这本书中几乎看不到公共选择思想的影响。考虑到他在公共选择理论发展过程中的先驱地位，这一切相当令人诧异。

《政治的进入壁垒》是为了将公共选择这一主题像在南方经济学会中那样，引入美国经济学会所做的努力。事实上，我在一次会议上宣读了这篇文章，它还被收入了该次会议的论文集。小组讨论后，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的系主任主动找到我，说他认为这是个很值得关注的领域，而且我们应该尝试在这一领域多做些工作。通过这件事，宣传活动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很显然，这位系主任在这篇文章之前，根本没听说过公共选择这个领域。

这篇文章另一个挺有意思的地方是，我意外地预见到了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关于自然垄断的重要贡献。自然，建议对它们采取拍卖的方式就是变相地引入政治方法。后来，他关于同样观点的严肃意见对于该领域的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本书中的下一篇论文《一般不可能定理的一般无关性》有一段有趣的故事。这篇文章刚发表时，公共选择理论的学术圈子还很小，但这篇文章的影响相当巨大。随时间推移，公共选择理论的圈子发展壮大，大批谙熟高深数学的学者纷纷加入。这篇文章先是被或多或少地遗忘了，然后又遭许多人反驳。后来这些反驳又被“反驳”，结果，尽管这一领域的现代文献极度复杂，但我们实际上回归了这篇文章所持的立场。我猜想这一系列事件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现代数学训练对于欧几里得几何学的重视程度比我受教育时要低得多。

总之，这篇关于无关性的文章研究的是一些关乎广泛公众利益的议案，如，真正的公益（public goods）或公害（public bads）。当然，所有政府的很大一部分活动都涉及利用互投赞成票通过各种次要的具体条款。我意识到这种无关性理论并不适用于上述一类工作，这令我或多或少把关于这个问题的数学性讨论留给了数学家们去做，而并没有捍卫我自己的立场。

《降低社会成本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成本与政府行动》是两篇关于政府合意的活动领域的文章。公共选择理论最初涉足这一领域时，当时的正统思想主张，市场不完善时我们应求助于政府。而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认为，只有在有理由相信政府将比市场的失灵程度更低时，我们才应求助于政府。在最初写作这篇文章时，这还是一个新颖并具有一定程度的革命性的观点。这两篇文章是对当时传统智慧的抨击的一部分。

《互投赞成票的简单代数模型》其实就是一种利用笛卡儿坐标系处理互投赞成票的简便方法。我把我高中学过的解析几何课程都忘得差不多了，有一次我忘了该如何移动椭圆的位置以及改变椭圆的形状，等等。我于是跑到图书馆去查阅高中的数学课本，而